

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求索

郑 刚, 付 延

摘要: 作为一位身处社会巨变之中的教育家, 孟宪承早期教育思想中的民本色彩、社会功能观和主体意识, 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 孟宪承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作出了探索。在理论探索中, 他充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地位与需求, 辩证地汲取苏联教育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历史文化。在教育实践中, 孟宪承致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 探索高等师范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之路, 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孟宪承的教育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孟宪承;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60(2025)04-0167-09

孟宪承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他以毕生精力投身教育研究与实践活动,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成果, 对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孟宪承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教育研究工作。他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中华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相结合,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新篇章。目前学界有关孟宪承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他的高等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 以及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学治校活动等方面, 在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贡献问题上则鲜有关注。因此, 本研究着重考察孟宪承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探究其在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倡导与应用, 分析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作出的历史贡献。

一、孟宪承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基础

孟宪承早期教育思想中的民本色彩和社会功能观反映了他对教育与社会、教育与民众关系的深刻思考, 而他在教育研究中展现的主体意识, 则进一步彰显了其立足本土、融通中西的学术追求。孟宪承早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 为其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奠定了重要的

作者简介: 郑刚,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付延,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9)。

思想基础。

（一）孟宪承早期社会教育思想中的民本色彩

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中，孟宪承始终关注民众需求，他的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民本色彩。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平民教育思潮的发展，诸多学者走出象牙塔，奔赴城市和乡村开展社会教育，孟宪承也投身其中。孟宪承主张社会教育“是大多数人民的教育”^①，要面向广大民众。一方面，孟宪承对平民教育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怎样做民众教育的实验？》等多篇论文，介绍了大量欧美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推动中国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域外借鉴。另一方面，他亲身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先后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江苏无锡北夏民众教育试验区等地指导平民教育工作。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孟宪承的社会教育思想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办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教育。他倡导“民众自身感觉的需要”就是社会教育的出发点，认为社会教育“应当把人民全部的生活加以分析及具体的研究，方可知道，哪几种技能、习惯、态度、知识才是他们所必须要的”^②。关于社会教育目标的确立，孟宪承主张应亲自到民间去，与民众共同生活，“切实调查他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略加主观见解而选择整理，调查所得之事实，共同定出一个目标”^③。这种深入民众生活之中探求社会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的思路，体现了孟宪承社会教育思想中鲜明的民本色彩。

孟宪承教育思想中的民本色彩不仅体现在对社会教育的实践倡导与理论钻研方面，还体现在他对其他类型教育事业的认识之中。例如，孟宪承认为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的研究，还在于知识的普及推广，大学应该“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其知识于它的‘宫墙’以外，而有所谓‘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④。孟宪承还撰写了《大学到民间去》一文，介绍国外大学服务成人教育的经验，认为“凡是公款设立的大学，应该省览一番，便可憬悟到自己对民众应尽的责任了”^⑤。总之，对民众需求深切的、持久的教育关怀构成了孟宪承教育思想的鲜明底色，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孟宪承早期教育探索中的社会功能观

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既受到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等的制约，也反作用于社会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孟宪承已初步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认识到教育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影响。他从教育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在学理层面对教育的社会作用作出了阐释，建构了教育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内在逻辑。孟宪承认为教育有两重使命：一方面要适应现在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为将来社会提供进步的动力。^⑥他指出，“教育对于社会的贡献特别巨重”“由教育所产生的力量，能成为救国的原动力。这种力量可以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

^{①⑥}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辞汇 教育社会学讲义 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黑伟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9、231页。

^{②③⑤}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1、182、251页。

^④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教育概论 教育通论 〈民本主义与教育〉讲义 大学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79页。

保存民族赓续的文化”。^①基于对教育功能的理性认识，孟宪承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例如，在对高等教育的定位上，孟宪承提出大学的三重理想，即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较为全面地概括了高等教育的功能，丰富了对大学职能和作用的认识。

面对国家的贫弱和社会的种种沉疴痼疾，孟宪承坚定地认为教育要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他在论述教师的责任时谈道：“我们的儿童和青年，和别的民族的儿童和青年一样，是活泼、壮健而旺盛地生长发展着的。怎样培养和引导他们的发展，系着民族的前途。这不是教师的夸张，而是他应该认识的使命。”^②20世纪30年代，孟宪承倡导将社会教育的方向转向乡村地区，将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作为乡村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主张“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他强调乡村教育应着眼于民族振兴，“我们于各自努力一项乡村工作或一个乡村的改进时，要照着这共同的指向，时时注意于这乡村与整个民族的联系”^③。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上层建筑能够发挥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④孟宪承早期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朴素的社会功能观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得到印证，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教育有限的社会功能提供了思想铺垫。

（三）孟宪承早期教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

早在民国时期，孟宪承的教育理论研究便有着鲜明的主体意识。在对西方教育理论的引介中，孟宪承秉持着辩证的观点，致力构建中国化的教育学理论体系。学贯中西的孟宪承并不迷信西方教育理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其加以选择和借鉴，最终目的在于使教育学这一舶来品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基于早年的留学经历，孟宪承在教育研究上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他善于从欧美教育理论中汲取养料，翻译了《现代教育学说》《教育方法原理》《教育哲学大意》等多种西方现代教育学名著，介绍欧美教育新思潮、新趋势。然而，孟宪承反对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西方教育理论，对于译介的国外教育学说，孟宪承都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论析，取其所长，反对全盘接受、食洋不化的“拿来主义”。

在辩证地看待西方教育学说的基础上，孟宪承撰写了《民众教育》《大学教育》《新中华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等多部教育学术著作，分析、借鉴西方教育理论，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构建本土化的教育理论体系。孟宪承的代表作《教育概论》就反映了这一点，该著“吸取国外的教育理论，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教育理论……强调外来教育

^①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34—135页。

^②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教育概论 教育通论〈民本主义与教育〉讲义 大学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7页。

^③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

理论的本土化，为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①。在教育研究中，孟宪承在接受、吸收和运用域外教育理论时，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他对构建中国本土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不懈追求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自觉，为其后来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二、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承确立人民立场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借鉴苏联教育理论理解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1956年以后，孟宪承将研究重心转向教育史领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这一从“立场确立”到“理论吸收”再到“本土发展”的演进过程，不仅体现了孟宪承教育研究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也展现了其构建本土教育理论体系的自觉追求。

（一）立足人民立场探索符合新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属性。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事业的发展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承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更为“坚决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②，在教育理论探索中进一步关注人民的地位与需求。一方面，孟宪承在对新旧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他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然要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保障工农群众享有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这既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进步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鲜明特征。1951年，孟宪承撰文批评旧教育的缺点：“在旧的政治经济制度下，一切创造文化、创造科学的劳动人民的受教育的机会，是被剥夺着、限制着的。这与新中国当前的情况和需要，就显然不符。”^③他认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要使青年和儿童能够接受教育，还要关注广大工农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需求。

另一方面，在教育史研究中，孟宪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审视人民群众在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在教育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孟宪承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了人民群众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例如，在《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第三章编写工作的总结中，孟宪承批评道：“人民群众的教育，或被剥夺教育，没有鲜明的描画。这是用‘正史’材料的必然的毛病。”^④在调整该论著的选文时，他特别强调需要补充反映人民性的内容，“如从人民立场出发反抗统治思想反对儒家，有好的材料就应该补充，以改变选文的面貌”^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孟宪承实现了从自发关注到自觉建构的认识飞跃，真正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活动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

（二）学习、借鉴苏联教育理论以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理论建构的方向转变为“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人

① 周谷平：《纪念著名教育家孟宪承教授逝世三十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③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1、151页。

④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9—90页。

⑤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孟宪承讲录（一） 孟宪承讲录（二） 孟宪承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97页。

民教育》发表相关社论，提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①。教育学界很快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术的热潮。孟宪承指出：“苏联科学的方法亦即马列主义科学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②同时，他强调学习苏联教育先进经验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必须用“中国的语言与实例”进行合理阐释，这样的教育学才会“显得生动活泼而亲切”，中国教育工作者就更容易接受。^③

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对中国教育学界影响最大的著作当推凯洛夫的《教育学》。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总结与阐释也集中体现在对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过程中。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报告中，孟宪承对共产主义教育的本质、作用、目的和任务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均作出了论述。其一，基于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把握教育的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教育必然为一定的阶级所利用，并随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变革。^④基于对这个观点的理解，孟宪承提出共产主义教育的本质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武器”。其二，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和发展观，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人发展的基本因素既不是生物性遗传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外部环境，而是社会关系、革命实践和教育。^⑤孟宪承对“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等命题予以驳斥，指出教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对人的发展能够起主导作用。其三，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明确教育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指人在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包括人的社会关系、体力、智力、道德精神面貌、意志、情感、个性及审美意识和实践能力等各方面的和谐统一发展”^⑥。孟宪承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终极目的，“全面发展规定了包括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的任务”^⑦。

在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二编的报告中，孟宪承从教学目的、教学过程与教学方法三个层面讨论了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理论。首先，在教学目的上，孟宪承主张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的见解和信念，不单影响学生的认识与思维，尤其必须渗透他们的情绪和意志。”^⑧其次，孟宪承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指出学生领会知识的过程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过程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指导、组织学生学习的同时，要照顾到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发展阶段，注意调动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最后，在教学方法上，基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实践观，孟宪承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他指出：“教师要以各种练习、实验、创造性作业（如制标本、制模型、制图、制表），使学生亲身证明知识；并且要经常引导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养成应用知识的能力和习惯。”^⑨在孟宪承所作的两次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专题报告中，他从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批判出发，以苏联教育理论成果为基础，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化了我国教育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① 《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人民教育》1952年第11期。

^{②③⑦⑧⑨}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7、137、125、128、130—131页。

^{④⑤} 石佩臣著：《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页。

^⑥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育史研究

1956年后，我国的教育研究开始逐渐摆脱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照搬照抄的做法，注意与本国实际的结合。同年12月，《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①在对学习苏联教育热潮的反思中，中国教育学人开始走上了自主探索的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孟宪承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较为薄弱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目前世界教育史，缺的是中国部分，中国学者对此应该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进行填补。”^②1961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选编计划会议，决定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古代教育史》两部教材。为整理蕴藏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教育遗产，孟宪承组织力量着手编写两部著作，为中国教育史学科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孟宪承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开展中国教育史研究工作。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编写《教育史》教材的任务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学校、教育思想的发展，批判地吸收以往伟大教师关于教育和教学的思想和经验。^③在编写教材和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孟宪承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中国教育历史进程，如在《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三章的修订工作总结中，他谈到“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矛盾，尤其是经济基础内在的矛盾”^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尚未十分深入，在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方面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孟宪承反对机械化、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研究工作，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研究工作开展的科学方法论而非具体执行和操作的方法本身，“任何的科学的研究，都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但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代替各门科学的研究”^⑤。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孟宪承的教育史研究中得以体现。他认为研究各门学科时一定要结合学科的具体特点。例如，在确定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时，孟宪承主张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用于分析评价教育史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把这一复杂问题简化为以“唯心”“唯物”为唯一标准，而应作到在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其阶级属性和教育贡献。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唯心、唯物为衡量的唯一标准，那就太过简单化。历史上有唯心观点的人物不一定完全就是反动的，有唯物观点的人物也不一定就是进步的（如机械唯物论）。”^⑥他进一步提出：“今后我们评价教育历史人物，应根据主要的两点：一是他们代表哪个阶级；另一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其所继承的文化。”^⑦孟宪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不仅为构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方法论层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三、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推进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是几条枯燥的原理，而是与鲜活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紧密结合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②③⑤⑥⑦}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孟宪承讲录（一）孟宪承讲录（二）孟宪承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395、28、400、74页。

^④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9页。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具体教育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孟宪承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作用，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需求。

（一）致力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孟宪承呼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孟宪承驳斥了“经济建设时期，业务、技术是第一，可以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党领导的，只是政治斗争，但经济、技术是不懂的”等错误观点。^②他提出要自觉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强调“任何科学理论，在今天，只有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之下，才能正确发展”^③。孟宪承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摇旗呐喊，还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教育实践的结合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早在1949年10月，孟宪承便在浙江大学发起成立新教育研究会，积极推动教职员学习政治，研究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1950年下半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和浙江省教育厅合作创办中小学教育研究班，为中小学教育改革培训师资。孟宪承在该研究班上讲授苏联教育理论，成为全国表率。在讲授“教育学的哲学基础”的相关内容时，孟宪承着重讲授了教育学要以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新鲜的内容、别出心裁的分析论证，在学员中引发了热烈反响。^④1951年，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开设“马列名著选”课程，为开设好这门课程，孟宪承撰写讲稿，编写讨论提纲，指导学生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许多学生反映，“马列名著选”是他们学习过的课程中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⑤据张家祥回忆：“孟老师在当时为我们开设这样的课程，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刚解放就有孟老师这样的学者指导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⑥可以说，孟宪承在教育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倡导，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充分地与中国教育具体实际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倾力探索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办学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为培养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较高思想政治觉悟的社会主义师资队伍，国家亟须探索自己的师范教育之路。为响应“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号召，教育部决定在华东地区创办一所高水平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南北呼应。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孟宪承与其他同志反复讨论，决定以私立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文理科为基础，合并其他高校相关系科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兼任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呼吁全体师生员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① 冯建军：《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中国教育科学》2024年第3期。

^{②③}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3页。

^{④⑤} 董远骞：《教育学大师孟宪承的教学和治学作风》，俞立中主编：《师范之师：怀念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页。

^⑥ 张家祥：《敬爱的孟校长，我们深深地怀念您！》，俞立中主编：《师范之师：怀念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①，重视党中央交付的培养人民教师的光荣任务。

办好社会主义的师范大学，关键是要打造一支思想觉悟高、政治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兼具的高校师资队伍。面对由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旧高校拼合而成的班底，孟宪承以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作为首要工作，提出教学改革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参加重视我们现在进行的系统的、有计划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②。为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孟宪承不仅组织了多次集体学习活动，还设立政治辅导处，组织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改变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③

正确的办学方向使社会主义人才培养规格得以进一步明确。在学校的育人目标上，孟宪承重视学生政治觉悟的提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培养。在学校教学工作中，教育学科目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科目都受到相应的重视。^④对于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毕业生，孟宪承也勉励他们在未来工作中系统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持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⑤在他的办学理念影响下，学校在思想建设、教育改革、科学研究、教育实习、社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有特色的办学实践，开创了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办学道路，形成了社会主义师范教育模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民教师。^⑥

（三）自主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研究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史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师资力量十分匮乏，教育史专业师资和研究队伍的培养成为教育史学科建设工作的基本前提。自1953年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在苏联教育专家杰普莉茨卡娅的指导下，先后开办了教育学研究班和教育史研究班。其中1955年创立的教育史研究班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史学科的首届研究生班，该班共招收27名学生。由于授课内容仅有外国教育史而无中国教育史，所以有学生将其直接称为外国教育史研究班。1956年7月，由于苏联专家的提前回国，华东师范大学原本开办的教育史研究生班难以为继，学生提前毕业。孟宪承接受学校委托担任导师，从毕业生中挑选了江铭、张惠芬、李国均、郑登云、孙培青五人，举办了首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

华东师大创设首届教育史研究班，不仅要求所培养的学生能够讲授专业课程、从事科学研究，还要求他们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学习与应用是孟宪承指导研究生学习时一贯重视的。自1956年9月到1957年5月，孟宪承为研究生班讲授“中国古代教育史专题”课程。在教育史研究生班的第一堂课上，孟宪承便强调学好中国古代教育史，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又要占有大量原始资料，并需具备一定的古文阅读能力。他为学生指定的参考书中不仅包括中国古籍，也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江铭回忆，孟宪承曾叮嘱他：“不要认为学习历史，就可以丢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学，教育理论也要学。”^⑦

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孟宪承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教育历史问题。孟宪承专门讲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其作为分析教育历史问题的理论依据。在

^{①②③④⑤}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论文（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0、91、88、87、83页。

^⑥ 刘海燕：《孟宪承与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的办学探索及其时代价值》，《教师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⑦ 江铭、张惠芬：《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追思导师孟宪承教授》，俞立中主编：《师范之师：怀念孟宪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教育史各专题的探讨中，孟宪承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释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现象，注意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解读教育现象和问题。例如，讲授“殷周的教育”时，孟宪承指出：“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这是阶级社会的开始。阶级社会的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在奴隶社会时代，奴隶是无受教育的权利的……为了更清楚说明殷周的教育问题，需要分析一下殷周社会的阶级。”^①在讲授“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思想”时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状况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这种既强调理论学习又注重研究应用的培养方式，为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8年，五名学生完成学业后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有教育史“五虎将”之说，成为支撑新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孟宪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理论探索与办学育人实践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立足中国教育实际，以人民立场为根本，在借鉴苏联教育理论的基础上阐释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育史研究。在办学治校与人才培养中，孟宪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致力培养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教育人才。孟宪承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内涵，其坚持人民立场、注重理论创新、扎根中国实际等思想精髓，至今仍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回顾和总结孟宪承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汤浩泽）

Meng Xiancheng's Exploration of Adapting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Zheng Gang, Fu Yan

Abstract: As an educator in the midst of great social changes,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view of social function an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Meng Xiancheng's early educational thought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his acceptance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consciously accepted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and explored how to adapt i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back then.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he paid full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and needs of the people, dialectically absorbed Soviet educational theory, and studied China's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Marxist standpoint, viewpoint and metho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Meng devoted himself to 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xplored the socialist way of running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trained the first batch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with Marxist theory consciousness in China. Hi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concerning educational theory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adapt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Meng Xiancheng; Marxist educational theory;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① 杜成宪主编：《孟宪承全集·孟宪承讲录（一）孟宪承讲录（二）孟宪承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